



外语·文化·教学论丛

60 Yea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外国文学研究60年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编

何辉斌 执行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外语·文化·教学论丛

外国文学研究 60 年

60 Yea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编
何辉斌 执行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研究 60 年 /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7

(外语·文化·教学论丛)

ISBN 978-7-308-07782-8

I. ①外… II. ①中… III. ①文学研究—外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5012 号

外国文学研究 60 年

60 Yea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编

何辉斌 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 张 琛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56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782-8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开幕词·····	陈众议(1)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闭幕词·····	聂珍钊(4)

宏观反思

叙事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申 丹(9)
法国文学研究 60 年·····	吴岳添(16)
新时期普希金文艺思想研究概评·····	吴晓都(23)
捷克文学在中国·····	杜常婧(31)
60 年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主义·····	何辉斌(40)
波斯文学翻译与研究在中国·····	穆宏燕(55)
累土不缀——中国的阿拉伯文学 60 年·····	宗笑飞(62)
我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之路——献给祖国 60 华诞·····	黎皓智(68)

经典重释

乌有乡的客人——解读《来自乌有乡的消息》·····	殷企平(85)
圣伯夫——在现代性的门槛上·····	郭宏安(96)
乔叟何以被誉为“英语诗歌之父”?·····	沈 弘(115)
英国玄学派诗歌中的戏剧独白·····	吴 笛(126)
欧洲中世纪骑士叙事诗价值的再认识·····	刘建军(134)



- 三种《叶甫盖尼·奥涅金》注释本解读.....刘亚丁(141)
 “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许金龙(148)
 自传文学视角下的观照——茨维塔耶娃《我的普希金》的个案剖析.....查晓燕(165)
 丑陋的他者：批判还是警醒——也谈康拉德笔下的中国人形象.....王松林(173)

百家争鸣

- 论文化学转向与学者的文化自觉性.....范捷平(183)
 比切家族与美国文化记忆.....宁一中(190)
 战后美国青少年现实主义小说的嬗变.....芮渝萍 范 谊(199)
 一种不可或缺的救赎力量——论欧内斯特·盖恩斯小说中的宗教观.....隋红升(207)
 从伍尔夫“构思说”看中西诗学的共通性.....高 奋(215)
 “世界文学”——概念的形成及历史的演变.....王 宁(226)
 气势恢弘、新见迭出的文学史著作——评范大灿主编的《德国文学史》
蒋承勇(237)
 关于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构建.....汪介之(244)
 谈谈对外国文学史的编写.....郑克鲁(252)
 论国内学者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段汉武 李 坚 于丽娜(256)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开幕词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陈众议

各位同行、各位朋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华诞前夕，我们集聚一堂，回首以往，免不了感慨系之。本人不揣简陋，敬陈管见，以求方家指点、大会讨论。

一、最初十年：向苏联学习

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就曾十分关注外国文学，甚至以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学为主要取法，但从研究的角度看，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的实际成果却多为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而社会主义苏联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榜样。

“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无疑是 50 年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不二法门。除迅速从苏联引进马、恩、列、斯的文艺思想以外，我国学者还适时地翻译介绍了别、车、杜及一系列由苏联学者编写或翻译的文艺理论著述，同时对俄苏及少量的西方文学开展了介绍和研究。对苏联主流文学的颂扬自不必说，当时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1959 年的十年总结与反思，除了肯定与苏联、东欧文学及一些亚非拉文学作品有关的斗争精神外，其他研究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首先是对西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其次是过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筚路蓝缕、木铎启程，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积累了不少经验，引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观点和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文学研究并没有被极“左”思潮完全吞噬。明证之一是对姚文元的批评。姚在《从〈红与黑〉看西欧古典文学中的爱情描写》(1958)中以偏概全地全盘否定西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界的有关同志就曾旗帜鲜明地对其进行了批评。

二、1960 年：历史的分水岭

中苏之间早已存在分歧，但从 1960 年起双方开始公开交恶。此后，苏联文学被定为修正主义。极“左”思潮开始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蔓延，其核心思想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正是在 1960 年，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同时，也给西



方文学普遍地戴上了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帽子。20 世纪 50 年代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步入停滞状态。自此至 1977 年,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休克期。但外国文学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以非常形式,如手抄、口传等隐秘方式成为一股温暖的潜流。

三、近 30 年:天光云影共徘徊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外国文学的大量进入不仅空前地撞击了中国文学,而且在解放思想方面起着某种先导作用,从而为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借鉴和支持。

1. 没有外国文学作品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事实上,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改革是缓慢的、渐进的,本身远不足以催生类似的文学。但当时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吸收的速率又远远高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的步伐,这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 80 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并使之快速地融入世界文学。在这里,电影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而我国学者关于对西方现代派的界定(如“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等观点)不可谓不深刻。

2. 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摆脱政治与美学的多重转型,演化出目下无比繁杂的多元态势。应该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依然是缓慢的、渐进的,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一蹴而就,但我们的文学及文学理论却率先进入了“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这一步伐又远远大于其他步伐。我国学者关于后现代文学及文化思想的批评(如“以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等观点)不可谓不经典。

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化事业,乃至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前两个方面不言而喻,第三方面的显证之一是围绕人道主义的争鸣在一定程度上为“以人为本”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978 年初,朱光潜先生从外国文艺切入,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文艺复兴至 19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开启了最初的论争。虽然开始的论争仅限于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但很快发展到了对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大讨论。1983 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的有关人道主义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是年,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文章多达七百余篇。这无疑是对“文革”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一次清算。两年后,讨论再度升温,并且加入了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重因素。

诸如此类为推动我国与国际社会在人本、人权等认识问题上拉近了距离,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丰富这些价值和认知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鉴。

综观 60 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1) 前 17 年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模式,从而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后 30 年又基本上改用了西方模式,

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与学术范式；而且饥不择食，故而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也比比皆是。当然，这是另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借冯至先生的话说，我们好像“总是在否定里生活”。而这次年会便是格物致知、信而有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将这种简单梳理复杂化的一种努力；(2) 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外国文学学科，依然任重而道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结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科自身的一些问题，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外国文学学派；而且对于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将大有裨益。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会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所对东道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表示诚挚的感谢。祝大会圆满成功，各位代表健康快乐！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闭幕词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 聂珍钊

各位专家、同事们、朋友们：

在浙江大学领导的支持下，在外语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的精心组织下，我们来到西子湖畔，举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幕式拍集体照的早上，我们已经感受到热情的 6 月杭州，但是我们更感受到热情的浙江大学的朋友们对学术的追求和真诚的友谊。

首先我想借此机会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学会工作的王春生同志介绍给大家，欢迎他来到学会指导工作，让我们表示欢迎。

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前，首先让我们感谢浙江大学和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为这次会议提供的支持。感谢外语学院前任院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范捷平教授，感谢外语学院院长何莲珍教授，感谢会务组组长何辉斌教授，感谢会务组全体同志和所有为这次会议作出奉献的人。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这次会议就要圆满结束了。这次年会会期不长，但是讨论的内容却十分丰富。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文学史的构建与教材创新”、“经典的传统阐释与再解读”、“名著译本的比较研究”、“翻译、出版和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论与批评”共五个方面的议题展开，举行了两场大会主题发言，分六个小组进行了两个半天的讨论，涉及的研究领域有欧美文学、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理论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亚非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小组讨论会议还就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60 年进行了总结和探讨，这对于我们总结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经验得失很有意义。

这次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与会专家的组成老中青完美结合，显示出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特点。中青年专家已经开始大展宏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外国文学研究的队伍在继续壮大，尤其是青年学者队伍的壮大让人感到高兴，因为中国的学术需要他们来传承。

会议讨论理论联系实际，具体而深入。涉及的议题较多，体现出学术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从这次会议的讨论看，外国文学研究学风踏实、方法科学、态度谦逊、学术境界较高。刚才的分组汇报的发言已经充分说明了大家在这次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已经表

明这次会议实现了我们的学术目标,取得了成功。

借此机会,我想在这儿谈几点意见:

第一,我们要继续贯彻严谨务实的学风。文学研究有自身的规律,不能急功近利,只有老老实实在地做学问,长期坚持,才能有所成就。我们现在的学术环境还不能说是一种完全绿色的环境,还有一些功利的追求和唯科学主义的束缚和禁锢,因此我们更需要排除干扰,建立起高尚的学术理想,坚守和守护属于我们自己的这块学术净土。

第二,要壮大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继续夯实学术研究基础,重视基础研究,立志做各自研究领域的真正的专家。文学研究应该从最基础的学问做起,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好高骛远,不能追赶时髦,尤其是不能让功利或实用主义或科学主义主宰我们的研究。我们应该拒绝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的那一套。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按照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制定的发展路线,坚持学术自由的理念,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老老实实在地做好自己学术研究中的几件事,出几项能够代表自己、代表国家以及能够到国际学术中去竞争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真正的学问家、专家,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中共中央为我们制定的战略目标。

第三,我们要加强思考我们所进行的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无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把大量西方的文学以及学术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进行研究,参考借鉴,消化吸收,无疑繁荣了中国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在享受西方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要从中反思,我们在国际学术中作了哪些贡献?应该怎样作出贡献?总体上说,我们在国际学术影响力方面还十分弱小。因此,我们要思考我们所进行研究的价值问题,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思想,要在介绍、引进、借鉴和吸收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再向前大大地推进一步,希望从我们中间产生更多的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和得到承认的专家,希望中国的专家从中国走向国际。

第四,我们还要思考我们的学术研究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们担负着弘扬民族学术和民族文化的道德责任,这也是我们的伦理义务。我们把西方的文学和学术介绍到中国,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把中国的文学和学术介绍到世界上去,即如何在响应中央提出的“走出去”战略方面进行努力。也就是我们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个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历史上有过西学东渐时代,现在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下东学西渐的问题。

以上几个问题主要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还没有来得及同会长陈众议先生沟通,不过通过平时同他的交流,上述内容实际上也包括了他的想法。以上看法只是供大家参考和批评指正。

从总体上说,本次会议收获颇多,一是对拟定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二是见到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三是在杭州城里、西子湖畔领略天堂美景,陶冶人的性情,获得了美好的精神享受。总之,我们通过这次会议,在



人间天堂杭州，在浙江大学，收获了学术，收获了友谊，收获了思想。我们将带着对这次会议的美好回忆返回各自的单位。

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对我们未来的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将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产生新的推动。现在我提议，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这次会议圆满成功和结束这次会议。

宏观反思

叙事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申 丹*

国内外对于叙事结构和技巧的研究均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在采用结构主义方法的经典叙事学(叙述学)诞生之前,对叙事结构技巧的研究一直从属于文学批评、美学或修辞学,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当代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其他国家,成为一股独领风骚的国际性叙事研究潮流。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投向文本内部和互文关系,着力探讨叙事作品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使叙事研究趋于科学化和系统化,深化了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叙事艺术的水平。

就经典叙事学而言,国内的研究与西方呈现出不同走向。西方经典叙事学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但70年代末至90年代,众多西方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意识形态,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少学者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反对形式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这对经典叙事学造成了强烈冲击。^①诚然,跟新批评一样,经典叙事学批评隔断文本与语境的关联,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但这些形式主义流派对文本的结构技巧、遣词造句加以仔细考察的做法则很有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典叙事诗学(叙事语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像普通语法一样,叙事诗学是对抽象出来的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和结构技巧的研究,无需考虑千变万化的语境。然而,在西方学术界,虽然经典叙事诗学的模式和概念一直在以不同方式得到应用,但由于没有对批评和诗学加以区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者纷纷宣告经典叙事学的过时和死亡。^②

由于“文革”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经典叙事学才开始引起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

* 申丹,教授(长江学者),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和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① 当时十分兴盛的解构主义浪潮则对经典叙事学形成了另一种冲击。

② 申丹:经典叙事学研究究竟是否已经过时?《外国文学评论》2003(2); Shen, D. Why Contextual and Formal Narratologies Need Each Other. *JNT: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2005 (2).

出现了一些评介论文^①以及王泰来编译的《叙事美学》(1987)和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1989)等译著。在西方经典叙事学处于低谷的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的经典叙事学翻译和研究则形成了第一个高潮。西方叙事学家著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书不断以译著的形式在中国的 90 年代出现,包括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马丁的《当代叙事学》、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等。与此同期,国内学者经典叙事学方面的研究论著纷纷问世,出版的专著包括徐岱的《小说叙事学》、傅延修的《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罗钢的《叙事学导论》、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等。采用经典叙事学来研究文学作品的博士和硕士论文也明显增多。

20 世纪 90 年代还出现了以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为代表的本土叙事研究的热潮,旨在建构既借鉴西方模式,又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或将西方的理论概念运用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分析。^②学者们将西方的经典叙事学与我国的叙事研究传统相结合,取得了不少成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普安迪在北大的学术演讲集《中国叙事学》(1994)和旅英学者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1)在国内出版后,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就经典叙事学而言,中国学术界之所以会出现跟西方相反的研究走向,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1)政治文化氛围的不同。与西方学界经历了长期形式主义批评之后转而进行政治文化批评的发展轨道相反,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是在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之后,才转而进行形式审美研究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为新批评、经典叙事学、文学文体学等各种形式批评学派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如果说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形式审美研究被视为保守反动的話,在经历了长期政治批评的中国,形式审美研究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思想的解放。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在文学评论领域,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方批评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社会历史语境,但真正从政治上反对形式审美研究的中国学者却寥寥无几,与西方学术界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社会历史语境的兴趣往往可归结于希望跟上当今国际潮流,对文本做出更为全面和富有新意的阐释,而不是像很多西方学者那样是出于狭隘的政治目的。1980 年前后,形式审美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曾一度占据了更为“合法”的地位,后又与文化研究同步发展。这可说明,文学批评理论究竟是否“合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大环境和历史发展的轨道。(2)形式主义带有理想化的普世真理的色彩,像经典叙事诗学这样的形式主义研究迎合了“文革”后一部分中国学者在幻灭之后再度对普世真理追求的需要。(3)在实用的层面上,叙事学的分析

^① 最早的研究论文有张隆溪发表于《读书》2003 年第 11 期的“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

^② 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则是较早的借鉴西方叙事学来进行本土化叙事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模式可操作性强,容易掌握,对于教学与研究有较大的实际意义。(4)从政治和社会学批评转向形式审美研究,为对作品做出富有新意的阐释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途径。

在20世纪90年代,不仅国内的经典叙事学研究之热与西方经典叙事学的被冷落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就后经典叙事学而言,国内的研究也与西方的研究出现了另一种不同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诞生了既关注作品的形式结构又考虑语境和读者的各种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这些后经典流派90年代以来发展势头强劲,到90年代中后期合力构成了叙事学研究的复兴。但在国内直至世纪之交,无论是译著还是与西方叙事学有关的论著,一般都局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忽略了西方的后经典叙事学。^①诚然,对于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应当以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为基础。以前,在国内对于经典叙事学尚未达到较好了解和把握的情况下,集中翻译和研究经典叙事学无疑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完全忽略西方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则令人感到遗憾。这种忽略可主要归结于信息的闭塞,对国外的发展缺乏了解。

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开始推出“新叙事理论译丛”,所翻译的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作——兰瑟的《虚构的权威》,修辞性叙事学的代表作——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多种跨学科叙事学的代表作——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后现代叙事理论的代表作——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以及费伦和拉宾·诺维兹合编的全面反映叙事学研究新进展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②这套译丛的出版对于我国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后经典叙事学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后经典叙事学的翻译、研究和应用,逐渐形成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少中国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文本与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但与此同时,形式审美研究仍然很受重视。

2004年12月,由漳州师范学院、《文艺报》报社、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在福建东南花都召开,会上不少代表就如何促进后经典叙事学在国内的发展交流了看法,这对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在我国的携手并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会议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次研讨会为我国叙事研究者的定期聚会和交流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2005年11月,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成立大会”,会上成立了叙事研究者期盼已久的全国性叙事学研究组织,会议论文集于2006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2007年10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了“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多位国际知名后经典叙事学的代表人物到会作了主题发言,会议论文集于2008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会议的议题较广,既有对中国叙事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对西方叙事

^① 香港学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版的罕见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成果。

^② 该译丛还包括跟叙事学既有关联又形成对照的希利斯·米勒的《解读叙事》(1998)。



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审视,体现了我国叙事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些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对于推动叙事学研究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叙事学分会成立后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更是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与国际接轨。2009年10月在四川外院召开了“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第二届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将有美国、德国、加拿大、挪威和国内的一百多名学者参会交流。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社会科学》于2006年10月在全国率先开辟了固定的“叙事学研究”专栏,每月一期连续登载叙事学的论文,现专栏已出版近30期,这对叙事学研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主要表现在期刊论文的快速增长(博士和硕士论文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上。根据中国期刊网文史哲栏的统计,1994至1999年共有七百多篇叙事研究方面的期刊论文面世,而2000至2008年则快速增长至6800多篇,2009年前五个月就已经有600多篇。《河北学刊》2008年第四期刊登了赵宪章的《2005—2006年中国文学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基于CSSCI中国文学研究关键词的分析》,该文统计了2005—2006年间CSSCI论文在“文学理论”这一领域中的关键词,“文学理论”这一笼统的关键词自然排第一位,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文学叙事”。赵宪章在质疑了“文学理论”这一关键词的大而化之之后,这样写道:“令人欣喜的是,这一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也十分显著,这就是位居第二的是‘文学叙事’,如果将同‘叙事’相关的关键词[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叙事结构、叙事艺术等]合为一体,则达到了135篇次,超过总篇次的10%,其研究热度相当可观。”¹毫无疑问,叙事学研究已经发展成国内的一门显学,而且跟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

当前,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1)中国叙事诗学的建构;(2)西方叙事理论的评介,尤为关注后经典叙事理论;(3)中国叙事理论和西方叙事理论的比较研究;(4)将叙事理论运用于对叙事作品的阐释;(5)中外叙事作品的比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主流)叙事文学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非文字媒介叙事和非主流叙事,包括影视叙事、图像叙事、网络叙事、广告叙事、新闻叙事、日常叙事、少数民族叙事,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论界,有不少学者对西方文论称霸的局面进行了反思。在叙事研究界,有学者提出要完全搞中国自己的叙事学,不要受西方的影响。我们不妨从研究对象入手来看看这一问题。就文学而言,我国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研究对象:(1)中国古典叙事文学,(2)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3)外国叙事文学。中国古典叙事文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要较好地研究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就需要建立从中国文化出发的中国叙事学。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借鉴了很多西方的叙事结构和技巧,西方叙事学

¹ 在进行统计时,赵宪章先生显然没有考虑“文学叙述”、“叙述模式”、“叙述策略”、“叙述结构”、“叙述艺术”等关键词,若加以考虑,还会增加21篇次,总数会达到156篇次。